第十七章
共和国农垦部长

第一节 “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1956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农垦部,任命王震为农垦部部长。

中央选定王震担任农垦部长，并不是偶然的。王震对于农垦事业情有独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垦事业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如前所述,早在 1941 年，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王震就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率领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塞外江南。党领导的农垦事业就是在这里奠基的，王震和他的三五九旅就是最早的开拓者。正如王震在一次会上所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

在我们的将领中间，像他这样有意识、自觉地选择这样一条道路，走这么一步棋，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干下去的并不多见。当将军的人很难得自己把军服脱下来，带领部队不享受国防军的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遇，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吃苦耐劳、流汗流血。王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也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中国农业是王震心系终身的事业。他来自农家，可以说早年是为了农友的翻身才扛起了枪。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升华了他这份朴素的情感，当他以新中国农垦部部长之职回归农业的时候，他心中装的是作为中国经济之本的农业。

曾经长期和王震一起工作的邓力群说 王震决心脱下军装,想在土地上为国为民建立功勋，这个转变我认为是自觉的、热衷的。邓力群在一次会上说：王震同志在战争年代的业绩可以说是有口皆碑。仗打完了以后，这样一位战功显赫的将军，完全可以继续在部队里从事国防建设，穿起将军服，戴上将军牌，享受功臣的优越待遇。他是这样一种心情、这样一种想法吗？不是。对此，我在新疆深有感受。新疆和平解放后，部队驻扎下来，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从事农业建设、生产建设。对此，相当一部分干部想不通。从王震这个转变来看，他的心思不是用在国防军建设方面，而是用在经济建设方面。仗打完以后，他继续贡献于国家、贡献于党、贡献于人民的战场不是国防军，而是生产。生产中又主要是农业。这个转变是自愿的、自觉的。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看来不是心血来潮偶然想到的，而是从全局的观点想这个问题，从长远的观点想这个问题。很多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岗位的转变、心情的变化，不是勉强的，而是自愿的；不是没有准备的，而是有准备的。要建功立业，究竟是在国防军，还是在别的岗位上，看来答案是明显的。一到新疆,他就准备脱下军装,在新疆屯垦戍边。

1956 年初，王震还在率领铁道兵修建铁路。当中央酝酿成立农垦部的时候，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高兴地说：总理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

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要从解放军里调一个敢打敢冲的将军，比如像王震那样的人来办这件事，才能打开局面。

关于农垦部的任务,周恩来在同王震谈话时说“:农垦 '翻译成外语就是‘ 开垦荒地 ”。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边防、捍卫和建设祖国而作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是治国安邦的一项英明决策。周恩来在 1956 年 5 月 11 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财经部门组织机构的议案，其中提出增设农垦部并规定它的四项主要任务：“ 增设农垦部，管理垦荒移民、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和华南垦殖等工作。”5 月 1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此议案。同日，公布了包括王震为农垦部部长在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名单 ”。

农垦部统一管理全国的军垦农场和地方经营的国营农场。到 1956 年，我国农垦事业已初具规模。同 1949 年相比,国营农场由 26 个增加为 730 个 耕地面积由 45 万亩扩大为 1274 万亩 职工人数由 4300 人增加为 37.8 万人 ;工农业总产值由 385 万元增为 4.26 亿元 粮食总产量由 2000 万斤增长为 13.1 亿斤。

195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王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王震在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国营农场的目前情况和发展远景》的书面发言。他的发言首先回顾了我国军垦、农垦事业艰苦创业的历史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为了安置复员军人和被俘的蒋军官兵，曾开垦荒地建立农场。新疆的民族革命部队，在坚持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也曾经开荒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医治战争

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又动员了三十多个师参加生产建设。其中进入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在同本地人民军队及国民党起义军队会合以后，立即展开了劳动生产运动。在华南有几个师的转业部队，组织了垦殖局，种植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在此前后，全国各省为了解决复员军人和失业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也都建立了一些国营农场，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对农民起了集体经营的示范作用。由此可见，我们的国营大农牧企业，不是从接受地主资产阶级的遗产开始，而是依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开垦荒地发展起来的。

接着，王震在发言中规划了国营农场的发展远景和开垦的重点：“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开垦耕地 750 万亩，今年就可以完成，连军垦农场今年将共达到 1500 万亩。到 1957 年可共达到 2500 万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 3500 万亩，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国营农场的耕地将共达 6000 万亩。”

“为着完成上述开荒任务，我们计划以新疆、黑龙江和华南为重点，并且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发展大农牧业经济，经营不同的特产，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新疆地区的开垦，虽然水利工程投资大，但由于有了植棉的优越条件，已经有了植棉的经验，棉田的产量很高，年年保收。如果到 1962 年新疆军垦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的棉田增加到 400 万亩，每亩以产皮棉 120 斤计，那末，一年就可以产棉花 480 万担，相当于全国同年总产量的 10％。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和铁道兵农场，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耕地面积达到 3300 万亩，就可以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大豆 450 万吨（五年累计数），相当于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口大豆的一半。

“华南垦殖局的橡胶园，遭受 1954 年百年未有的大冻害以后，

现在已经逐渐恢复,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都有种植橡胶和热带特产饮料、香料作物的好条件。因此应该积极发展以热带、亚热带的作物为主的多种经营。”

其后,在谈到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规定:国营农场开垦荒地 4000 万亩,投资 20 亿元,安排 150 万人就业。这个计划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 1958 年‘大跃进’的形势下,王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开荒 8000 万至 1 亿亩,第三个五年计划再开荒 2 亿亩,到 1967 年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达到 3亿亩,使国营农场耕地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例从占 1% 到 15% 的高指标。这样的发展速度显然脱离了当时的实际,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王震任农垦部部长后,很注意吸取苏联建设国营农场的经验。1956 年下半年,农垦部派张林池副部长参加国家计委组织的代表团赴苏联谈第二个五年计划,访问了苏联国营农场部部长别湟吉科夫,请他介绍了苏联开荒建立国营农场的经验。农垦部的苏联顾问专家工作室也写了《关于铁道兵复员军人在黑龙江省开垦荒地》的书面意见,就农场的规模、试验站的建立、开荒农业技术上的几个问题提供了经验。1956 年 12 月到 1957 年 1 月,王震偕同农垦部畜牧兽医局、基建局、生产指导局的专业技术干部,并邀请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陈伯心教授、吴春江讲师到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所属各农场视察工作,在各农场和职工谈话,传达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各场开荒建场和发展畜牧业作了研究。王震还到友谊农场研究了该场的工作和支援铁道兵农垦局开荒的问题,会见了在友谊农场工作的专家,和陈伯心教授商谈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1957 年的毕业生于 4 月至 10 月来铁道兵农垦局进行教学实习,支援开荒工作。这批毕业生完成毕业考试后,大部分留在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区工作。

王震虽已离开了部队，仍十分关心国防建设，特别是部队复员转业干部战士的安置工作。他在 1956 年 11 月 13 日参加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时曾建议集体转业 20 个师参加农垦生产。他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呈转军委并中央的信中说：

“今天小组会上听了传达主席的指示后，肖克、甘泗淇同志谈到军队十个预备师和公安军可能有若干裁减问题。我和张林池同志研究后，提出如后建议：

“我认为十个预备师和若干公安部队裁减解散以及八十万志愿兵复员、十余万干部退役就业，在我国工矿业无法安插，农村人口又如此稠密，耕地如此缺少，人民生活虽在革命胜利后得以充饥，但是无可否认还是很贫穷，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因此，我建议集体转业农垦二十个师。这个问题，早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的三十余师集体转业的事实来考察，证明党中央和军委的这一措施是正确的。所以在目前再转二十个师垦荒建立国营农牧场。刘少奇同志指示用拖拉机开荒，后头用人力和牛马种地。最近总理又找我详谈，指示我考察东北垦区情况。黑龙江省现有国营农场和劳改农场各四十个，均可依靠这些农场作基础，就地安插十五个师（国营机械化农场三十八个，每人种一百五十亩地。我本月八日从黑龙江省回北京，农场大豆、水稻还有百分之三十埋在雪里面),即明年每兵种五十亩地,可按时中耕,收成可提高,拖拉机用去开荒。此外，盘山锦州间，日本人规划的一百万亩稻田，有完好的电力抽水设备，可安两个师。柏郭庄、芦台可安一个师，柴达木可安二个师，可大大节省开支，当年就有产品。我们可以完全相信，部队在党中央、国家和毛主席的号召下，经过动员会同心同德为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英勇劳动的。”

信中还提出“同时我建议,如果中央和军委考虑这个建议时,请派张云逸大将同志或其他同志当部长,我当副部长去黑龙江工作。这样,对于经建和国防建设是相结合的。”

对于王震的建议,军委办公厅于 1956 年 12 月 13 日复函王震“您建议集体转业 20 个师参加农垦生产问题,经军委研究后,认为此次裁减军队,主要是采取多复员、少征兵的办法,现有部队建制,不予撤销因此,目前集体转业 20 个师,是不可能的。”

王震的建议,由于各种因素当时没有被采纳。过了一年多,1958 年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包括 10 个预备师在内的 10 万官兵集体转业,奔赴北大荒参加开垦北大荒的建设。王震率领农垦部工作人员赶到密山,坐镇三江平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 10 万转业、复员官兵,并对他们迅速作好了安置部署。前后连续数月,王震忙得几乎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

从 1956 年 5 月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王震在农垦部部长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 10 年。这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也是我国农垦事业大发展的 10 年。经过 10 年的全面大发展,奠定了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基础。我国农垦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技术装备比较先进、职工素质较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比较高的大规模综合经营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

这 10 年中虽然有两次疾病困扰(1961 年 2 月做胃切除手术,1963 年 2 月患肠梗阻),王震仍全身心地投入农垦这一崭新的开拓事业。他的足迹走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不分严寒酷暑,在荒漠戈壁踏勘设计;深入农场基层调查研究,向农垦战士问寒问暖,现场解决各种问题。有好几年的春节,王震都是在边寨农场度过的。就是在带病休养期间,他也不停地在农场奔波,为农垦事业倾注了

大量心血。

第二节　率团东渡考察日本农业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农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1957年秋天，王震担任农垦部长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郭沫若、廖承志、王稼祥等决定派出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以作为对日本农业技术交流团访华的回访。他们请来王震开会共同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日本战后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有许多值得借鉴，应该派出各方面负责人及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会议最后商定由王震任代表团团长。当场有同志问王震：“中日没有建交,情况十分复杂,去日本怕不怕?”毛泽东替他回答:“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事实确是这样,他心里没有怕的,他什么也不怕。固然，当时日本还有一股反华势力公然与中日友好唱反调，为中日两国间的正常交往设置种种障碍，环境还很险恶。可王震毕竟是王震，战争年代面对侵略者的凶残他浑身是胆，这次有人邀请，为振兴中国农业取经而去，虽免不了受到干扰，又有何惧？

这个农业代表团阵容强大,成员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农机等方面共30名专家、学者。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魏震武、林业部副部长刘成栋（又名刘达）任代表团副团长。周恩来十分关心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起程前，他于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交付两项任务：一是向日本宣传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广交朋友，促进中日建交；二是调查了解日本农业的先进技术，并就如何吸取日本农业先进经验等工作授权王震酌情决定。

当这位名震日本的抗日名将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出现在东京羽田机场时，在日本社会引起一个不小的震动。战争刚刚过去十

余年，日本人的脑海中还鲜明地留存着当年那位横刀跃马、无所畏惧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各抗日根据地妇孺皆知的胡子将军的威武形象，而那些痛恨战争、献身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们却感到由衷的喜悦。羽田机场一片欢声，人们团团围住这位新中国的农垦部长、中国农业代表团团长、当年的胡子将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迫切地希望从这位抗日名将口中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情况，了解新中国人民的和平心声。

代表团在日本东北部地区访问一家农户时，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这家农户的主人、一位老农一见面就对王震说：“我认识你,你当年不是留着大胡子吗?”没有人问这位老农是否当过兵，怎样到的中国战场。人们只知道他被卷入战争是不情愿的。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国土上，并在这祖辈辛勤耕作的土地上接待了当年战场上无人不知的八路军著名将领。他们如同两位老农重逢般地拉起了农民的家常。他们交谈着、说笑着，谁会想到他们中的一位是抗日名将，而另一位是侵华战争中的日军士兵？虽然他们彼此的身份不同，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相通的，那就是对十余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惨无人道的侵华战争的痛恨。

访日期间，中国农业代表团的访问活动经常是远离城市，在各地乡间小路上奔驶。这时已是深秋，正是农业的收获季节。公路两旁是已收割完毕的农田，一堆堆稻捆晒在田间，还有晒在竹架上的萝卜等刚收获的作物……这正是了解日本农情的良好时机。

王震注意观察沿途农情，非常细心。有一天正在乡间行进，王震似乎发现了什么。他示意停下车来，大步走进一块刚收割过正在翻整的稻田。谁都没有在意那里有一台小巧的、忙碌着的农机。惟有王震眼尖，他发现了这不起眼的机械。这是一台由两个小号的胶皮车轮驮起的小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着有汽车方向盘作用的

长把扶手，扶手下是驾驶员的座位。机器的主人告诉王震，这是手扶拖拉机。王震仔细观察，反复问询，看中了它的小巧，认为它正好适用于中国南方的水田地带。他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回国内，并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中国开发、推广、普及手扶拖拉机提出建议。手扶拖拉机很快在中国应用了，一时间成为中国农民致富的帮手和富裕的标志。因它经济实惠，一机多用，不仅在我国南方迅速推广，北方农村也广泛使用。

在北海道，优质耐寒、味美香糯的大米引起了王震的兴趣。他想到几十万农垦大军正以血汗开垦着的北大荒的黑土地，中国东北肥沃的三江平原，那里的土地有条件引进北海道的优良品种。他将这种优良品种引进回国后，就由我国农业工作者培育出著名的‘农垦 57 号’‘农垦 58 号’等水稻新品种。

日本多雨，访问期间常见农民身披轻便的塑料雨衣在田间劳作。王震买了一批这样的雨衣带回国内，希望给中国农民的田间劳作带来方便。后来，一位日本的农业专家向王震推荐了农用塑料薄膜。在日本，为打破季节的局限，果农和菜农广泛利用薄膜培育蔬菜、水果，以便在淡季时能够拥有市场。日本的粮农更是充分注意到塑料薄膜的经济实惠，他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将塑料薄膜用于育苗育秧，以有效地提高产量。王震也将塑料薄膜买回来，并迅速地在我国大江南北城乡加以推广，成为重要的农用物资。王震在日本农村这些并非偶然的发现，竟改写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手扶拖拉机和塑料地膜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成为王震为中日农业技术交流树立的无形丰碑。

两个月全程陪同中国代表团活动的，除日中农业交流协会的田崎末松外，还有野间清和团野信夫二人。野间曾是留居中国的日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农业部工作，是副团长魏震武的部下。团

野是熟知农业并在农业方面颇有活动能力的记者，《朝日新闻》负责撰写农业问题社论的社论委员。当时，日本各级政府所属的农业实验场和研究机构由农林省或各地方政府直接管辖，没有上级主管的政府机关批准是不允许接待中国代表团参观访问的；因为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代表团又不可能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全靠团野从中斡旋，打通了所有渠道。几乎所有日本国立和部分县级农业实验场都向中国农业代表团敞开了大门，他们还按专业组织双方专家分别座谈、交流，使我们的专家们收获颇丰。

王震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历时两个月，肩负着中国共产党中央“考察日本农业，发展中国农业”的使命。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分别找王震谈话，了解日本农业发展情况。

毛泽东一见王震，劈头便问：“怎么样，有惊无险吧！”

王震回答：“报告主席，日本有人处处给我们设置障碍，但日本各界人士，包括普通老百姓却冒着危险接待我们，对我们十分友好。”

听了王震所讲的日本人民强烈要求与中国人民和平友好的一桩桩、一件件事例后，毛泽东又问道：“这次访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不少农户家挂的‘和为贵’条幅。”王震说。

“噢？日本农民把我们孟老夫子的信条供奉着。”毛泽东的浓眉一挑，巨手一摆：“有很多人热情接待你们，还有不少人知道你和你的三五九旅，甚至知道你留过长长的胡子，这说明日本民族和我们有着不少共同的民族特征，说明日本人民对那场侵华战争有正确的认识，日本人民伟大的和平愿望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根深蒂固的！王震呢，你这趟日本之行，除了农业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考察任务完成得不错外，日本人民和平愿望的考察任务也完成得不错。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地相处！”

毛泽东说“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她既保持自己民族的本来特性，又能非常敏感地接受外来的新技术。这点上，我们应该向日本民族学习。”

第三节　毛泽东说“搞生产要学科学技术”

毛泽东一向重视农业，也很重视农垦事业的发展。1961 年 2 月，王震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出院后经中央批准前往南方休养；4 月初旬途经武昌，住在湖北省委东湖招待所，正值毛泽东前来湖北视察，也住在东湖。4 月 7 日下午，毛泽东约见王震，就农垦有关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

毛泽东见到王震，首先问询了他的病情。随后问道：“你认为国营农场怎么样，有搞头么？”王震说“还是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不仅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而且在农业的技术改造中都需要国营农业企业，在十几年内开荒几亿亩，有可能，也有必要。”毛泽东问“究竟有多少荒地可开？”王震说：“经过踏勘，有 8 亿亩可开垦种农作物，其中 4 亿亩比较好，是头等地。”

毛泽东说，他刚从广州回来，从广州出发是白天，坐在火车上看，插秧还是太密。他直接派下去的同志专门找了几个人谈，一般都赞成合理密植。王震说，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出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毛泽东说，在政策上也是这样。关于所有制问题，关于公社的

组织规模等方面，没有像教科书那样出个本子，所以出了许多乱子。“十二条”（指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只解决所有制问题和平调问题，没有解决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将生产好的生产队去填补生产不好的生产队，这样，好的队不能多卖多留多吃，坏的队依赖好的队，好的和坏的生产队都没有积极性了。“六十条”（指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六十条”没有解决有关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

毛泽东接着对王震说，你和农业部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找些农业科学技术专家来研究一些技术问题。你到湛江去是否找几个人专门研究技术问题？王震说，有这个打算。毛泽东说，你还是以休养为主，同时认识一批农业科学人员，从中找一些人座谈。科学技术问题也要调查研究，可以编一本教科书嘛。王震说，主席说过科学是老老实实的，调不得一点皮。现在我们生产部门多了，要学业务知识，而我们现在政治学习多了，有些平均主义。我在这方面不怕落后。毛泽东说，这不叫落后。比如打仗，打两个好仗，一个不好的仗，这就算不错的将军了。打仗要军事技术，生产怎么能不学技术呢？从来我们都主张学技术，政治挂帅，就是要掌握技术。军队没有技术，还不打败仗？你们做些试验，找老农和科学技术干部参加。如一亩地种水稻收500斤，同样的土地种高粱也收500斤，把用工、用水、用肥作一些比较。王震说，我的家乡地名就叫高粱段，我和张平化同志谈过，搞两个农场作试验，种高粱。毛泽东说，搞试验可以，既然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这是不会失败的。王震说，我在家乡公社搞过试验，后来吹了。毛泽东说，现在好搞了，生产队有一定的自主权。

说到这里，毛泽东说，大就太大，现在一个公社就是过去一个

管理区,一个社 1000 户人家也是大。过去生产大队十几里，能看到的只在大队附近的一些地面。社有几十里，现在虽然划小，也还够大了。积累几年内不讲，五保户还供给，有点共产主义。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现在调查五保户只占五分之一，人数很少，真正将所有制问题改正过来，生产队之间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平均主义的问题解决了，上面的瞎指挥可以完全改正过来。你宣传农业科学技术不是瞎指挥。真正搞好了，有的一年就可以转过来，有的要两三年。两三年不搞积累，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得多吃，社队都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毛泽东还向王震问到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搞商品粮的情况。毛泽东说,不要那么着急,再研究一下能搞多少商品粮,要有数据。只要能搞到商品粮，农垦部可以搞些直属的国营农场。现在有哪几个?北大荒两个局、新疆、内蒙古就这几个吧！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关心建设兵团的工业建设，还说到“新疆倒是有石油”。王震汇报了建设兵团大搞工业、种植棉花的成绩,还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增加人,不增加设备,再开 1000 万亩地也可以。其后又谈到内蒙古开荒等问题。毛泽东要他同总理谈一下。

周恩来于 4 月 6 日飞抵武汉。王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同周恩来就内蒙古开荒、建立商品粮基地诸问题进行了谈话。

随后，王震来到湛江垦区，广为宣传搞生产要学习科学技术。他对当地农垦干部谈到毛泽东这次在武昌的谈话：主席说，中国的生产关系解决了，但生产力还没有解决。广东垦区要继续放手发展生产，把土地充分利用起来。5 月 1 日，王震在海南华南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热带作物学院,和那里的专家、教授、工作人员一起欢庆国际劳动节，鼓励专家、学者各就其专长作出贡献。他还要求研究所的成果一定要署上研究人员的名字，写上名字就是表示有人负责。研究成果的署名，这是个责任制问题。如有人提亩产 3 万斤，是什么根据提出来的？真是信口开河！回到北京以后，王震加强了和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专家的联系，将牡丹江垦区作为这些学校毕业生的实习基地。王震还多次约请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李竞雄等到垦区考察和讲学。

第四节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永存

就像毛泽东在王震将访问日本时候所说的那样：“他这个人没有怕的东西”。王震从来不怕鬼,不信邪,在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遇到困难，他总是迎着上。面对任何困难，他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从不屈服。1950 年春天，他率农垦部队在新疆北部打破北纬 42 度以北不能种植棉花的禁区，在地处北纬 45 度至 46 度之间的北疆准噶尔盆地玛纳斯垦区的小拐地区植棉成功。其后，新疆建设兵团植棉业空前发展,托起中国的“白银王国”。50 年代后期，他又领导植胶大军在海南突破北纬 15 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禁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北纬 18 度至 24 度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的惟一国家，创造了世界橡胶种植业的奇迹。1969 年 10 月至 1971 年 9 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他被“发配”到江西红星垦殖场蹲点时，还领导了对红壤的改良工作。一到那里,他就深入调查研究,在笔记本上写道“:红壤,在世界上占陆地面积的 38% 在中国占陆地面积的 22.7%,在江西占陆地面积的

64％，而红星垦殖场，几乎全是红壤土地。改造好红土壤，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大贡献。”经过多年奋斗，改造红壤取得成功。王震回北京后，继续关心红壤改良工作。1984 年秋，我国得到世界银行 3000 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在王震的亲切关怀下，江西及时得到了这笔贷款，在进贤、东乡、金溪、临川、崇仁等六县和红星垦殖场、省畜牧种场共开发了 2 万多公顷的红壤地。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开发项目便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5 年以来，先后有美、日、法、澳等国家的上千名专家、学者前来江西参观、考察或进行学术交流，江西也多次派专家参加有关学术会议。1989 年夏季，60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组团到红星垦殖场考察，香港《晶报》报道说：“他们对这个‘红壤地上的新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称赞这里的红壤开发为许多国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地农民群众为了克服困难而创造出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推广。经过调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于 1962 年上半年肯定了坚持“五个统一”下的包产到户和分散山区的包干到户。刘少奇也讲过：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但党内对此认识和态度并不统一。有的农村工作干部向党中央举荐这种办法，认为这种“责任田”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办法。也有的认为这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子恢认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多数能搞好“五统一”（即生产计划、大农活安排、抗灾、用水和分配方面的统一），不能说是方向性错误。生产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造，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他并引用了安徽农民的话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

好猫。

王震根据在各地农村了解的情况，赞成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意见。1962 年 7月，王震到湖南，回到他的家乡浏阳县北盛区。这是王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王震把汽车停得远远的,冒着雨,打着赤脚,走到老百姓房子里,问他们吃些什么 能不能吃饱？老乡说一天吃八两谷子，还要吃南瓜，吃后两三小时就饿了，一天要吃四五顿。中共北盛区委向王震汇报时提出要搞“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产量责任制的意见。王震当时同意他们搞试验。在王震出差不在北京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党组讨论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农垦部党组于 7 月 24 日向中央送出了《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纪要》。其中提到:“多数同志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到户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包产到户是目前恢复和发展农业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包产到户、责任田这个办法不一定好，会使有劳动力和无劳动力的农民向两极分化。因此，如何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得到好处是个重要问题。多数同志认为这种把包产到户和集体经济对立起来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没有认识包产到户这种方法并无损于集体经济的本质。”

不久,王震参加了 8 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包产到户责任制受到了压制，主张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意见，被指责为支持农民闹单干、刮“单干风”。在此之前，田家英外出作了几个月的调查，陈云也到上海作了调查。他们两人共同主张‘分田到户’。这个‘分田到户’和邓子恢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不完全是一回事。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单干。陈云、田家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